

毛泽东

与中国传统文化

主 编：王凤贤

副主编：谢宝森 滕 复

撰稿人：王凤贤 谢宝森 滕 复

林树建 丁晓强 杨张乔

卢敦基

安徽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丁怀超

唐伽

装帧设计:牛听

毛泽东与中国传统文化

王凤贤 主编

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合肥杏花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9 字数:470千字

1996年12月第2版 1996年12月第2次印刷

印数:00001—05000

ISBN 7-212-00992-X/A·2 定价:21.00元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	1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与逻辑.....	3
第二节 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形态与文化特质	11
第三节 毛泽东对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发展	15
第二章 毛泽东的成长与中国传统文化土壤	21
第一节 毛泽东的早年学习经历与学术志向	21
第二节 毛泽东的早期思想来源和学术立场	32
第三节 由历史、现实到哲学的抽象	44
第三章 毛泽东与中国传统哲学	56
第一节 中国传统哲学及其特点	56
第二节 毛泽东哲学实践论及其特色	67
第三节 毛泽东哲学矛盾论及其特色	90
第四章 毛泽东与传统政治思想	114
第一节 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及其特点.....	114
第二节 士人传统与政治抱负.....	122
第三节 传统学社与建党学说.....	129
第四节 农民起义与革命道路理论.....	143
第五节 兵家、纵横家与统一战线策略.....	157
第六节 民本思想与民主观.....	173
第五章 毛泽东与传统社会理论	194
第一节 传统社会理论及其近世的发展.....	195

第二节	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与毛泽东社会结构理论·····	207
第三节	毛泽东的社会调查理论·····	219
第四节	中国社会问题与毛泽东的研究·····	230
第六章	毛泽东与传统经济思想·····	263
第一节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及其特点·····	264
第二节	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	279
第三节	发展经济,保障供给·····	286
第四节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勤俭建国·····	295
第五节	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	302
第七章	毛泽东与传统伦理观念·····	316
第一节	中国传统伦理观念及其特点·····	318
第二节	道德哲学与伦理原则·····	334
第三节	君子风度与圣人境界·····	345
第四节	个人主义与现实主义·····	351
第五节	功利主义与奉献精神·····	358
第八章	毛泽东与传统文艺思想·····	370
第一节	古代中国文艺的地位及传统文论的特点·····	370
第二节	文艺与生活·····	378
第三节	文艺与群众·····	390
第四节	文艺与政治·····	403
第五节	毛泽东诗词:传统艺术形式现代化的 光辉典范·····	415
第九章	毛泽东与传统教育思想·····	426
第一节	中国传统教育思想及其特点·····	426
第二节	学以致其道: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438
第三节	学问见诸躬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454
第四节	身与心并重:德、智、体全面发展观·····	470
第五节	“愤启悱发”:对学习主动性的强调·····	478

第六节	“学在四夷”：两条腿走路的办学方针	488
第十章	毛泽东与中国古代兵法	505
第一节	中国古代兵学成就及对毛泽东的影响	506
第二节	革命的战争观和科学的战争方法论	527
第三节	人民战争和人民军队思想	546
第四节	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对中国兵法的 继承和发展	572
后 记		602

第一章 绪论

毛泽东是中国现代最伟大的政治家。他不仅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成就了中国革命的伟大事业，而且推进了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他的思想和事业与当代中国的社会和文化不可分离。关于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冷落之后，最近几年又热闹起来，出版了不少有关毛泽东生平、轶事、思想等各个方面的著作。这表明学术界和思想界已摆脱了“文化大革命”给人们心里留下的沉重的记忆和包袱。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能够心平气和地、公正地重新对待毛泽东及其思想，这正是客观研究的一个基础和开端。关于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之所以能够出现新的局面，首先应归于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肯定了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对他历史上的功过是非做出了全面的评价；《决议》还批判了以往任意拔高毛泽东以及“文化大革命”以后所出现的全盘否定毛泽东及其思想的“左”和右两种错误倾向，这对于廓清人们思想上的混乱与迷惑，理智客观地看待毛泽东及其思想，起了重要的引导作用，同时也为这方面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出发点。我们认为，《决议》的重要意义主要并不在于给了毛泽东重新评价，而是在于它使人们从以往的思想禁锢和迷惘中解放出来，重新开始了理性的思考。

思想的解放与科学理性的恢复，为学术带来了繁荣。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出现的新局面，其表现除了有一批成果问世外，在研究的广度与深度上也有新拓展。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伴随着学术界开展的关于中西文化讨论的新的热潮，不少学者开始了毛泽东及其思想同传统文化关系的研究，并且出版了一批很有新意的著作。毛泽东与传统文化关系的研究是关于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的一个新领域，这个新的研究领域的开辟具有重要的意义。不过就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还只是个初步，多数的研究还只限于毛泽东哲学思想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关系这一方面，其他方面的研究甚少，而关于毛泽东思想与整个传统文化的关系，我们见到的也只有汪树白的《毛泽东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①这一本书。这是远远不够的。毛泽东不仅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也是中国现代文化史和思想史上杰出的人物。毛泽东的最大成就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相结合，同中国固有的民族思想文化相融合，从而使作为一种外来的思想文化——马克思主义融入了中国民族文化的生命和血脉之中，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理论和中国现代文化的指导思想，它诚如《决议》所说，体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总结和集中了全党和全民族长期的革命与建设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思维的成果^②，同时，它也体现了毛泽东个人的创造。而无论是作为集体思想还是作为个人思想，都是对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批判与继承的结果，融汇了传统文化的有机内容。就前者而言，它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同中国固有文化所发生的某种关系；就后者而言，则又体现了毛泽东本人在运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革命的实践过程中，对

① 汪树白：《毛泽东与中国文化传统》，厦门大学出版社1987年12月版。

②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中国文化传统及其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所形成的独到的思想认识和理解。毛泽东一生的研究和创造遍及哲学、经济、政治、历史、军事、社会、文学和艺术以及教育等许多学科和领域，在这些领域他都有杰出的思想和理论上的成就。而这些思想和理论上的成就，都批判地继承了传统思想文化的某些内容及其特点。所以研究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本身就构成了毛泽东研究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与逻辑

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它的形成有一个历史过程，也有一种内在的逻辑必然性。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是我们在研究毛泽东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过程中首先要面对和需要回答的问题。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一件重要的大事就是引进、吸收和消化外来的西方先进的思想——马克思主义。

研究毛泽东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必将涉及到一些很重要的问题，需要我们予以认真的思索和回答。这些问题主要有：一、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文化的关系；二、毛泽东思想的文化土壤及其同中国思想文化传统以及同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三、如何估价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它对于现代中国文化发展的作用和意义，等等。下面我们仅就这三个方面的问题来谈一点心得和看法。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文化的关系问题，也是毛泽东及其那个时代所面对的首要问题，是毛泽东思想产生的历史与文化的背景，是它的两个思想的来源。自从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这一外来的思想就同中国文化及其现代的发展结

下不解之缘。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文化的结缘既是现实的，也是历史的，是与中国文化历史与现实的双重结缘。我们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有价值的内容相融合，就是指的这一现实与历史的双重结缘。这种结缘的结果便是造就了毛泽东这样的人物，并产生了毛泽东思想。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说，毛泽东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某种意义上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文化的关系。从这一点上看，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首先有助于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关系的深入认识与理解。而另一方面，对于后一层关系的理解和认识反过来也可以作为研究前者的出发点。

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文化的关系？我们认为至少要把握住两点：

其一，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文化的关系是两种不同的文化相互融合的问题，换言之，是中国民族文化对他民族先进思想和文化因素的又一次吸收和选择。吸收他民族的先进文化因素以增强自身文化的活力，是人类各民族文化发展的普遍需要。中国文化在其 5000 年的悠久的发展史上，曾经多次吸取外来先进文化因素来发展自己的文化。其中大规模地引进和吸收外来先进的思想和文化有三次。第一次是汉代以后印度佛教文化的输入。佛教文化的输入对中国固有的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影响遍及宗教、哲学、文学、艺术、伦理、民俗、社会心理等各个领域。这次外来文化的输入经历了由汉至唐几百年的吸收、批判、选择和消化的过程，最后形成了许多中国化的佛教学派，佛学被摄入了中国文化的生命之中，成为自身的内容。第二次是明清之际西学的传入。当时大批的耶稣会教士来华传教，他们带来了西方的科学与文化。这次西学输入的规模也很大，时间也相当长，在大约近 200 年的时间里（从意大利耶稣会教士利玛窦 1582 年来华算起，至 1775 年罗马教皇下令解散耶稣会为止），来华的传教士络绎不绝，他们中

有许多学识渊博的学者,带来了大量的西方文化与科学的著作。如1620年法国传教士金尼阁一次就携来教皇保禄第五赠送的图书7000余册。西学的传入对封建专制制度下因循守旧的中国文化造成猛烈冲击,尽管受到种种封闭政策的阻挠,但是受到了许多进步思想家的重视,如黄宗羲、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都是当时热情欢迎和学习西方文化与科学的先驱。西学的冲击与当时思想文化界的启蒙思潮相呼应,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了积极的影响。第三次便是近代鸦片战争以后西方文化的再次输入。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用炮舰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使一向自我感觉良好的“天朝大国”终于意识到了自己文化上的落后与脆弱,因此,学习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以救亡图强,成了当时有识之士普遍追求的目标。这诚如《邵氏危言》卷上所说:“道光、咸丰以来,中国再败于泰西,使节四出,交聘于外。士大夫之好时务者,观其号令约束之明,百工杂艺之巧,水陆武备之精,贸易转输之盛,反顾敝然,自以为贫且弱也。于是西学大兴,人人争言其书,习其法,欲用以变俗。”这次外来文化的输入较之前两次规模大得多,中国文化在面临生存危机的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对吸收外来文化以激发新的生机做出了异乎寻常的努力探索和选择。从郑观应、张之洞等人代表的早期改良派和洋务派,到康有为、梁启超等代表的维新派,再到孙中山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一直到20世纪初以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人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都各自从不同的立场相继对引进和吸收西方文化做出了自己的选择。这些选择从本意上说都是积极的,其目的都在于期冀吸收外来文化的有价值的东西来充实中国文化的内容。从洋务派的选择直到中国共产党人的选择,体现的正是中国文化在走向现代的过程中一个有内在的连续性的探索和努力。这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艰难的过程中,中国人不断从西方学到了许多东西。

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现代文化的指导思想,这在今天看

来已是一种历史与现实的必然结果。对于这个结果，世界上有许多人至今仍不能接受，但这毕竟是历史的事实。对于这个事实，任何一种关于中国现代思想与文化史的力求客观和理性的研究都是无法否认和回避的。问题在于必须从人类现代文化发展的角度予以合理的解释与说明。不断吸收他民族先进的思想文化以充实自己，是每个民族文明发展的需要，也是现代人类文明发展的一种普遍趋势。中华民族直到今日仍在不断从西方学习先进的文化与思想，以推动自己现代文明的发展和改革，如我们今天学习、借鉴和吸收西方以及其他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市场经济的思想、经验、体制乃至哲学、法律、道德、文学艺术、教育、社会管理机制各个方面一切有益的内容，等等。可以说，不同民族文化之间互相取长补短，借鉴和吸取他民族思想文化中适合于自己的有价值的内容来不断充实自己，这正是人类文明发展和民族文化更新和前进的内在动力之一。20世纪初中国从西方和俄国学来马克思主义，亦应作如是观。它体现了中国文化在走向现代过程中，通过学习外来先进思想文化以激发自己生命力的一次重大选择。

其次，马克思主义的引入虽然是中国文化走向现代的一个重要的选择，然而选择是一回事，能否适应中国文化的需要并真正同中国文化相融合则是另一回事。这意味着有两个方面的重要问题需要不断认识和解决：第一，马克思主义必须不断去适应中国的国情。中国的国情是特殊的和不断在变化着的，因而，作为一种外来文化的马克思主义若要能够不断适应变化着的中国国情的需要，一方面必须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以及在社会实践中实事求是地对待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另一方面，则要特别注意必须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思想不断跟上中国国情的发展，跟上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步伐。这就要求在吸收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必须确立两种观念，一是实践观念，实践是思想的唯一出发点，是检验理论的标准；二是发展观

念，马克思主义理论要发展，要在实践的过程中不断依据实际的提出新的思想，创造新理论。第二，马克思主义从文化形态上看，它是西方文明土壤上产生出来的思想成果，它的思维的模式、理论的样式都具有西方文化的特点，这些形式与特点是与中国文化及中国人固有的思维模式和特点有差异的。这意味着必须对马克思主义作文化改造，使其理论具有中国特点和民族形式，从而使其最终为中国文化所消化，融合于中国文化的血脉中。中国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对外来思想文化有价值的东西的借鉴、吸收都是如此。这一点已为中国文明史的发展所证明。

马克思主义在传播过程中必须同社会实践相结合，必须同民族文化相融合。对于这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已有清楚的认识，认为他们关于人类文明道路和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理论，只是向人们提供“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提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①。由于各国、各民族的社会历史发展及文化状况的差异，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至于这些国家要经过哪些社会和政治发展阶段才能同样达到社会主义的组织，我认为我们今天只能作一些相当空泛的假设”^②。他们不可能也“不打算”提供向统一的共产主义过渡的具体方案和预定的社会组织模式，他们指出“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③。马克思本人在研究中就十分注意各国之间的历史及文化的差异。他对人类社会发史的研究尽管以西方为典型，但早年就注意到东方的问题，并提出了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晚年又提出俄国等东方民族在社会革命与文化发展进程中，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著名设想。马克思对东方文明及发展道路的研究，固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40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353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179页。

然对东方民族的革命及文化发展具有某种指导意义，但最重要的是他认识到不同的民族文化有其不同特点，因而马克思主义只是提出了一般性的理论，它不能包办代替，必须从各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同时在引进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必须注意文化的差异性问题的。列宁对此也有深刻的理解。他说：

对于俄国社会主义者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一般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①

列宁认识到东方其他一些国家“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的革命带有更多的特色”^②。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看到了民族文化传统及现实的差异性，并且提出了他们的理论必须联系各国革命实际情况具体地运用的思想，强调了不同国家和民族革命应有不同的特点。但是他们没有进一步明确论述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文化必须同其他国家和民族文化相融合这一问题。列宁虽曾经成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于俄国革命的实践，但是俄国革命70年，并未做到马克思主义同俄国文化的完满结合，其原因之一也许是俄国文化与欧洲文明本来就有某种姻缘关系，这种文化上的同一性常常掩盖了双方的文化差异，这为看清文化上的差异并努力使二者相互融合从而消溶这种差异增加了一定的困难。

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和中国文化发展的过程中，始终就面临着如何将引进的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国情和具体的社会实践相结合，同中国固有文化相结合的问题。这就是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亦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运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具体实践的过程中，逐

① 《列宁选集》第1卷，第203页。

② 《列宁选集》第4卷，第692页。

渐使这一外来文化为中国文化所吸收和消化，并使其具有民族的形式和补充民族的内容，从而使之纳入中国文化的系统而成为中国文化结构中有机的部分。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吸收与接纳，促发与增强中国文化的生机，使之迅速摆脱落后的局面，跟上时代的发展，并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毛泽东在实现这一既定的文化目标的过程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毛泽东思想即是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都有深刻的论述。如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这一重要的历史文献中，从文化的高度全面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文化的民族特点相融合的重要性。他认为，中国应该大量地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但决不能生吞活剥，必须经过自己充分地消化才行。在这一基础上形成的文化应该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个性。他指出：

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也是这样，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

……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①

毛泽东这里已明确提出了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民族形式的思想。在中国共产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刘少奇对毛泽东的这一思想作了发挥，他指出，“要使马克思主义系统地中国化，要使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变为中国形式”，就必须有像毛泽东同志那样“具有最高的理论上的修养和最大的理论上的勇气”的无产阶级理论家“进行大胆的创造”，“依据历史进程每个特殊时期和中国具体的经济、政治环境及条件，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作独立的、光辉的补充，并用中国人民通俗语言的形式表达出来”。这种具有民族形式并补

^①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07页。

充了民族文化内容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即“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又完全是中国的。这是中国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和理论上的最高概括”^①。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及其战友的确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和发展上已经注意并把握了这个不同文化融合的问题，而且毛泽东及他那一代人在理论与实践的探索中，通过运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的实际，通过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也基本解决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如民主革命时期的问题、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的一些问题，等等。当然，在解决这些重大的时代问题过程中是有许多挫折的，失败的教训和所犯的错误几乎与成功的经验一样多。有些问题仍需要继续认识与探索。总之，两种不同文化融合的问题解决起来是非常困难的。如佛教自东汉传入我国，直到唐代才完全地为中国文化所消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同样需要很长的时间，需要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努力。毛泽东解决了一些问题，但同时也留下了许多问题。邓小平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提出并建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在理论与实践两个层次上深化了对中国现代文化前景的看法以及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关系的认识。这一深化实质上反映了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和观念上的重大变化。这种变化最终会导致人们进一步摆脱以往的思想框框，对马克思主义及其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从不同角度，做出种种新的思考与估价。

^①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35、336页。

第二节 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形态与文化特质

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它在理论形态上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而在文化特性上则是植根于中国文化历史传统与现实的土壤，体现了民族思想的一种内在延续和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必须研究其生长的民族文化土壤，以及与民族文化土壤的关系。可以看出，民族文化土壤包括历史与现实两个方面。我们这里研究毛泽东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只是侧重于其中的一个方面，即他与历史文化传统这个方面。至于毛泽东与中国文化现实的关系，或者说毛泽东的革命实践，并不是这一研究的侧重点。尽管如此，我们需要郑重说明并强调的是，对毛泽东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研究，并不能脱离对毛泽东与中国文化现实的关系的研究，脱离对他的革命实践的研究；同时，也不能脱离对毛泽东及其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关系的研究。这三个方面的关系构成了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中的三个主要侧面，表明了毛泽东思想的三个方面的来源。这三个方面的思想来源就是：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二、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所获得的关于中国实际的经验和理论；三、批判继承了传统文化中的某些优秀思想内容和民族思维特点。后两个方面的思想来源决定了毛泽东思想的中国特色，赋予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的形式并补充以民族的内容，因而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中这三个理论来源并非简单地拼凑，而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因此，研究毛泽东与中国传统文化之关系不能脱离其他两个方面。另外，研究毛泽东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还必须考察他的早期思想，以及向马克思

主义转变的过程，等等。以下我们就这几个方面的问题加以阐述。

首先，我们必须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及其特点做出深入细致的研究。因为传统的思想和文化作为毛泽东生存和成长的土壤，是他最先接受的东西，构成了他的早期所形成的主要文化知识的素养和思想基础，同时也是他以后力图改造的东西。

中国是个有着 5000 年悠久的文明历史的东方大国，曾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为后人留下了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这是一笔十分宝贵的财富。中国古代文化遗产是劳动人民与知识分子共同创造的，在中国传统文化创造的历史长河中，曾经出现过许多学派，涌现过一大批著名的思想家和学者，他们在哲学、政治、社会、经济、伦理道德、军事、文学艺术、教育乃至科学、历史、宗教等各个思想和文化领域，都做出了出色的贡献。毛泽东是一位出色的思想家和学者，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批判和继承集中反映在各个思想文化领域。所以，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和说明，也主要着眼于思想文化领域。另外，在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研究中，要特别注意把握各个学派和思想家思想上的共同特征，把握民族思想的特点。历史上每个学派和思想家都各自站在不同的时代和立场，对于社会及思想文化各个领域中的一些重要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观点。他们的看法、观点乃至思想理论体系是有差异的，而每个时代的思想都体现了对前一时期的思想的发展。我们的研究则是要立足于时代思想的发展，透过不同思想之间的差异，去着重把握它们的共同特征。也就是说要把握思想文化发展中共性的东西，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精华体现的正是民族思想的共性。把握了民族思想的共性，也就把握了民族思想的特点。中华民族思想文化上有许多自身的特点，毛泽东批判继承的也正是这些体现了中国特色的东西。

其次，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必须注意把握历史与现实的联系，要对毛泽东生活和实践的社会现状及其所面对的思想与文化的现状